

主观阶层、流动感知与社会参与意愿*

——基于网络调查的实证研究

谭旭运 豆雪姣 董洪杰 张 跃

提 要：基于以中青年为调查主体的社会心态手机网络调查（SMS2017）数据库，研究从阶层流动感知的动态视角探讨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在水平和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则负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此外，在小幅度向上流动条件下，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在大幅度向上流动条件下，主观阶层显示出负向的预测作用。这表明，向上的阶层流动感知以及适当的向上流动空间是促进各阶层积极社会参与的关键，同时，过大幅度的向上流动则会消极影响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提升。

关键词：阶层流动感知 主观阶层 社会参与意愿 流动幅度

一、引 言

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参与、干预、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区的公共事务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包括人际交往、劳动参与、闲暇活动和社会互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杨宜音、王俊秀，2013；张镇等，201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可见，社会参与是促进自我发展，提升心理健康和幸福

*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项目编号：16ZDA231；主持人：王俊秀）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心态视角下主观社会阶层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CSH040；主持人：谭旭运）的支持。

感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力量和衡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柳拯、刘东升，2013）。而探明影响广大民众参与各类社会生活事务意愿的因素是提高其社会参与水平的前提。在当前，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不断提升、互联网的发展都拓展了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群体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通过网络自由表达社会参与的需求和意愿（彭兰，2008；喻国明，2015；时昱、沈德赛，2018）。因此，关注中青年群体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不同阶层的个体在社会参与意愿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愿意通过社会参与活动来解决问题，以此保证自身利益（王新松，2015）。然而，最近有关社会阶层（包括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关系的大量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悖的结论（帅传敏、张钰坤，2013；Greve，2009；James & Sharp，2007；Piff et al.，2010）。笔者认为，这种不一致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当前研究忽略了阶层流动的探讨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使得个体所处阶层的位置及其主观阶层在其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常有变动。而这种流动往往会影响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意愿选择。比如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代际观念的差异，中青年群体形成了不同于父代的态度与观念（李春玲，2018）。另外，新老中产阶层虽然在主观阶层上类似，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存在非常大的区别：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而以中青年为主的新中产阶层的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张翼，2016）。因此在探究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时，不能只关注个体对其当下所处阶层认知的高低，而应该在阶层流动的动态视角下重新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人们对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往往比他们所经历的客观事实上的阶层流动对其行为的态度或意愿影响更大（Turner，1992：9），本研究聚焦于民众对自身阶层流动的主观感知，并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相科技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的大样本网络数据库，从阶层流动感知视角来重点探讨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体的民众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的思路 and 有效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 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

社会阶层 (social class) 可以区分为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 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客观阶层, 即关注个人实际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社会资源的多少 (陆学艺, 2003)。而心理学研究则更多关注主观阶层, 即个体对自己所处阶层位置的主观评价, 强调了人们的主观认知成分 (Kraus et al., 2012)。研究表明, 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变量表现出不同的预测作用 (Tan & Kraus, 2018)。但无论是探讨客观阶层还是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影响的研究, 结论上都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

从客观阶层来看, 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也会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和组织能力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Wilson & Musick, 1997), 他们更愿意通过政治参与来保证自身利益的需求更高, 同时也更关注社区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议题 (王新松, 2015)。文化程度越高或收入水平越高的中青年群体, 其环境保护意识越高, 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和志愿服务意愿也越强烈 (帅传敏、张钰坤, 2013; Lee & Pritzker, 2013)。但一项慈善捐赠意愿的调查研究却发现, 低社会阶层者愿意将年收入用于慈善捐款的比例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者 (Greve, 2009)。

从主观阶层来看, 那些对自身的财富和收入状况有积极认知的中低水平收入者在捐赠活动上更加慷慨, 也更愿意呼吁其他人做出捐赠 (Wiepking & Breeze, 2012; Bennett & Kottasz, 2000)。但同样有研究得出了与之不一致的结论。比如皮夫等人 (Piff et al., 2010) 通过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系列实验发现, 主观阶层更低的人在慈善捐赠情境中会更加慷慨, 并且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助人意愿。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社会认知理论的支持, 即低主观阶层者具有情境主义 (contextualism) 认知倾向, 更加依赖于外部条件, 更关注社会环境变化, 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意向; 而高主观阶层者则多以自我为中心, 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倾向, 亲社会意向较低 (Kraus et al., 2010)。此外, 还有研究发现低主观阶层者 (即弱势者) 倾向于强调道德、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 更加关注集体利益, 因而合作意识较高; 而高主观阶层者则更加关注个人利益, 具有较低的合作意识 (刘长江、郝芳, 2015)。

可见, 在以往研究中, 关于包含中青年群体的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参与意愿上

的差异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说明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往理论解释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未能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来探讨社会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而这是极富意义的。

（二）阶层流动及其流动感知与社会参与意愿

阶层流动（class mobility）也称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人们社会位置的变动，即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客观变化（陆学艺，2003；关丽丽、崔淑芳，2007；张翼，2011）。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总体阶层流动率呈逐步上升趋势（李路路、朱斌，2015）。中青年群体在各种人员中的阶层流动占有较大的比重，且对自己向上流动有较强的信心（雷开春，2015；吴炜，2016）。尽管主观的阶层流动与客观的阶层流动有关，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系，而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王俊秀，2018）。有学者指出，客观的阶层流动是衡量个体从现有制度条件下是否获益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主观的阶层流动又可以称为阶层流动感知，即民众对社会流动现实的主观体验，反映了个体对已获得的社会阶层和目前生活水平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对个体行为的态度影响更大（Turner，1992：9；盛智明，2013）。根据布迪厄（Bourdieu，1984）对流动轨迹的类型划分办法，可以将阶层流动感知划分为向上流动感知、水平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感知三大类型（范晓光、陈云松，2015）。

研究者们很早即关注到社会流动及其感知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比如，持“分离论”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无论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当个体离开自己以往所处的社会阶层时，就会给个体带来心理压力或心理问题，使得个体更具有功利个人主义倾向，即更加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意愿（Daenekindt，2017）。这种“分离论”的观点虽然关注到了流动，但是却并未发现不同方向的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因此备受争议。已经有研究发现向下流动会导致更大的健康威胁（Collins et al.，2015），而向上流动则带来更多的健康获益（Gruenewald et al.，2012）。在幸福感研究领域，研究者发现向上流动能够积极预测个体的幸福感，而向下流动则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消极影响（Chan，2018）。事实上，这一研究结果与“文化适应论”（the acculturation thesis）的观点不谋而合（Daenekindt，2017）。该理论认为，向上流动者更可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因而会有更多的动力去适应新的文化，也更积极地看待社会系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

参与意愿；向下流动者由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更可能抵制或排斥向下流动的文化适应过程，也更加消极地看待当前的社会系统，因而对参与社会事务表现出较少的关注度和积极性（Daenekindt, 2017；Blau, 1956）。

三、研究假设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在获得了基本的自然性生理需要之后，必然就会产生较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马斯洛，2014）。对于那些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中青年来说，其社会性需求通过阶层上升的过程而得到了满足，同时激发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观阶层越高的个体，这种满足感越强烈，因此参与的主人翁意识就会增强，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便会大大提高（马传松、朱桥，2012）。此外，根据“文化适应论”也可以做出相同的推论（Blau, 1956；Daenekindt, 2017）。因此，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也就越高。

对于那些水平流动感知者，其主观阶层基本维持不变，意味着他们受到所处阶层环境的稳定影响，从而形成了所属阶层特有的态度、观点和行为风格（Abramson & Books, 197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高阶层者的自我中心取向或低阶层者的情境主义取向，由于阶层流动的停滞而带来的阶层固化体验使得前者会更加关注自我需求的满足，后者会更加依赖于外界环境或他人的支持（胡小勇等，2014）。有研究发现在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时，富人往往更吝啬，表现出更少的捐赠意愿（Côté et al., 2015）。而以“富人”“官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钱民辉、陈旭峰，2014），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既得资源不被分走，其社会参与的意愿自然也不会太高。因此，水平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可能越低。

除此之外，在社会发展中难免也存在着一部分向下流动感知者，尤其是当那些高主观阶层者体验或感知到向下的阶层流动之后，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拥有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的缺失，就会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Sawaoka et al., 2015）。而一旦个体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便容易引发消极情绪和不平等的社会心态（孙灯勇、郭永玉，2016），从而减弱其社会参与的内在动力。同时向下的阶层流动体验也会激发中青年的挫折感和失败感（Tolsma et al., 2009），二者都会削弱高主观阶层者的社

会参与意愿。因此在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所处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就会降低。

从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在向上流动感知的条件下，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就越强烈。

假设 1b：在水平流动感知的条件下，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越低。

假设 1c：在向下流动感知的条件下，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越低。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大量处于中下层的中青年社会成员通过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但是在这些向上流动的群体中，既存在社会阶层的稳步上升情况，也存在一夜暴富而来的大幅度跃升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中青年群体而言，由于感知到的流动幅度不同，其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平稳良好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如果出现短期的急剧变化，则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盛智明，2013）。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在稳步上升的流动情况下，其主观阶层越高，越能够体会到社会发展对自身阶层提升的积极作用，更愿意参与那些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亲社会活动；而对于那些一夜暴富式的向上流动中青年而言，他们缺乏对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正确感知，因此社会参与意愿会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2^①。

假设 2：对于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在向上流动幅度较小，即稳步上升的情况下，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当向上流动幅度过大时，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反而越低。

综合以上分析，中青年群体对于以往社会阶层流动状况的主观感知，可能是影响其目前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关系的重要解释因素。因此，本文尝试在阶层流动感知视角下，厘清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具体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阶层流动感知在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即不同阶层流动感知方向（向上流动感知、水平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感知）和流动幅度（大幅度、小幅度，主要是向上流动感知的幅度大小）条件下，处于不同主观阶层的中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

^① 鉴于整体以向上流动为主的社会现实，以及数据库中向下流动个体比例较低（占本研究总样本的 12.7%）、幅度变化较小，本研究仅聚焦向上流动情况下的流动幅度带来的影响；对于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的流动幅度与社会参与的关系，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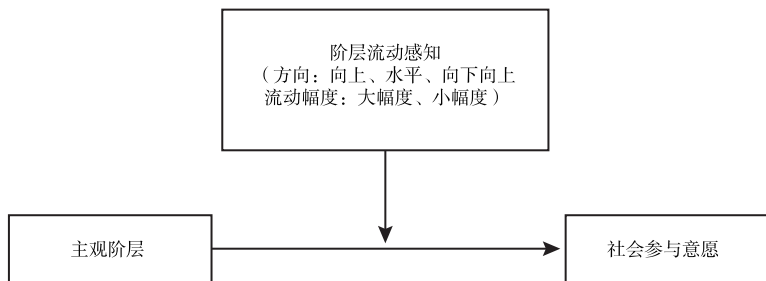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说明

(一) 数据来源

由于社会参与所涉及的是与个体经历相关的问题，具有较高敏感性，采用面对面访谈或入户面访的方式可能给调查对象带来压力，从而影响答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网络调查则相对更容易表达真正的情绪和意愿，真实性更强（佟成军，2017）。因此，本研究选择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 SMS2017）的网络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编制，通过智媒云图自主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宝”^①，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共约110万人，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城市）推送问卷，再通过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进行滚雪球式发放。问卷收回后，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答题完成情况、逻辑检验等对问卷进行筛选。SMS2017数据库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调查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24364份，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669份，有效率为93.04%。

(二) 样本分布情况的描述分析

如表1显示，SMS 2017数据库中，男性占56.9%，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① 目前问卷宝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能够实现定制化调查和精准的问卷推送，依照调查目的向特定的用户群推送问卷，被访者需要经过系统认证，系统能够检测用户在问卷填写过程的特征，对乱填乱写的用户进行剔除并列入黑名单，从而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男性人口占 51.27%) 相比没有显著差别。样本平均年龄 27.38 岁, 中青年人口 (1980—1999 年出生, 即 18~37 岁, 占比 89.7%) 比例相对较大。这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2018) 发布的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基本一致, 报告指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39 岁群体占全体网民的 73.0%。

表 1 2017 年社会心态调查样本在各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计数 (N)	百分比 (%)	变量	类别	计数 (N)	百分比 (%)	
性别	男性	12897	56.9	受教育程度	小学毕业及以下	366	1.6	
	女性	9772	43.1		初中毕业	1915	8.4	
年龄分组	1990—1999 年	13779	60.8		高中 (技校、职高、中专) 毕业	6573	29.0	
	1980—1989 年	6549	28.9		大专 (含在读)	5550	24.5	
	1970 年及以前	2341	10.3		大学本科 (含在读)	7248	32.0	
户籍状况	城市户口	9559	42.2		研究生 (含在读) 及以上	1017	4.5	
	农村户口	13110	57.8		月收入情况	1000 元以下	5189	22.9
婚姻状况	未婚	12662	55.9			1001~3000 元	5537	24.4
	已婚	8836	39.0			3001~5000 元	6010	26.5
	正式分居	135	0.6			5001~7000 元	2769	12.2
	离婚	232	1.0	7001~1 万元		1660	7.3	
	丧偶	46	0.2	1 万~1.5 万元		518	2.3	
	同居	492	2.2	1.5 万~3 万元		363	1.6	
民族	其他	266	1.2	3 万~5 万元		255	1.1	
	汉族	21480	94.8	5 万~10 万元		196	0.9	
	少数民族	1189	5.2	10 万元以上		172	0.8	
宗教信仰	佛教	3428	15.1	职业类型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851	3.8	
	道教	387	1.7		专业技术人员	4752	21.0	
	伊斯兰教	273	1.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631	7.2	
	基督教	743	3.3		商业、服务业人员	3334	14.7	
	天主教	168	0.7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976	4.3	
	其他宗教	120	0.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1889	8.3	
	民间信仰	751	3.3		军人	87	0.4	
	没有宗教信仰	16799	74.1		其他	9149	40.4	

(三) 变量的测量与操作化

1. 因变量：社会参与意愿

使用 SMS 2017 中 6 个题目的自编问卷，测量被访者的社会参与意愿。具体测量内容包括：是否愿意为帮助受困受灾的人而捐款捐物；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向政府机构、媒体等反映意见；参加绿色出行、节约用水、垃圾分类、减少使用塑料袋等这类活动；向有关部门举报腐败行为。题目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方法，1 表示非常不愿意，7 表示非常愿意。对六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alpha = 0.82$ ）。此外，如图 2 所示，不同测量题目的评分分布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将六道题目的平均分作为社会参与意愿的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被访者社会参与的意愿越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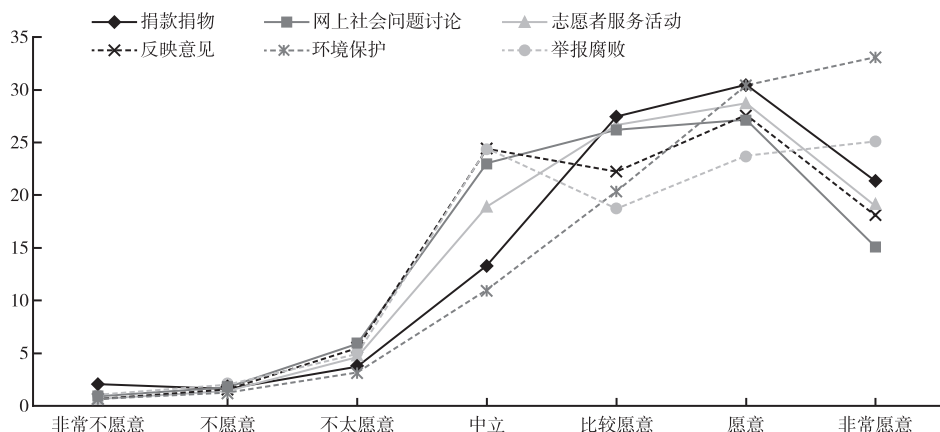


图 2 被访者在不同社会参与意愿题目上的分布情况

2. 自变量：主观阶层

SMS 2017 采用经典的十级阶梯来测量主观阶层（如图 3 所示）。首先，给被访者呈现一个十级的阶梯图片，自下而上标记上 1~10 十个数字；然后，告知其“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如图所示，梯子从上往下看，10 代表最顶层，1 代表最底层”，要求被访者选择其中一个数字表示自己所在的阶层等级，所选数字越大，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处阶层等级的认知评价越高。本研究选用两个题目来测量被访者现在的主观阶层，具体题目是“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在哪个等级上？”。研究将两个题目的平均分作为现在主观阶层的测量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被访者

认为自己现在所处的阶层位置越高。两道题目在不同选项上的人数分布情况如图 4 所示，结果表明被访者对自己目前所处等级和生活水平所处等级的主观评价大致相同。对两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alpha = 0.7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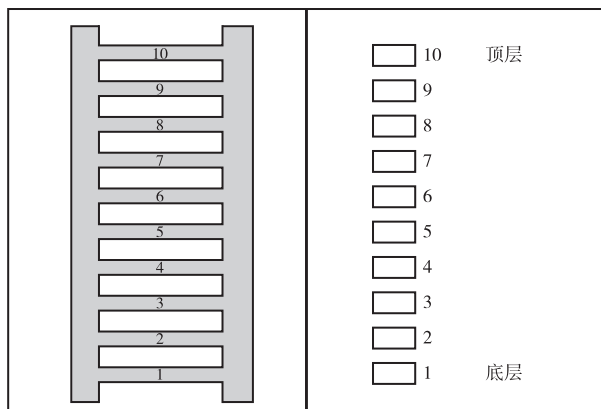


图 3 主观阶层测量题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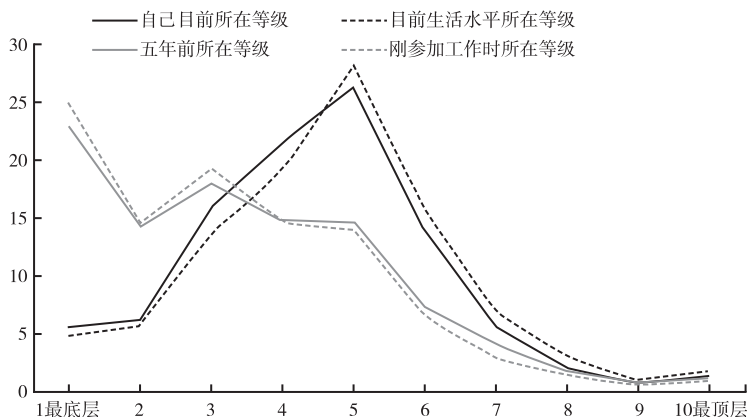


图 4 被访者在不同主观阶层测量题目上的分布情况

3. 阶层流动感知

问卷中同样用十级阶梯的方法测量了被访者五年前和刚参加工作时的主观阶层，具体题目为“您认为您五年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刚参加工作时在哪个等级上？”，然后取两题目的平均分其作为被访者过去的主观阶层。两道题目在不同选项上的人数分布情况大致相同，如图 4 所示。对两道题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

显示其内部一致性良好 (Cronbach's $\alpha = 0.71$)。

本研究对阶层流动感知的测量是通过现在主观阶层减去过去的主观阶层,得到了一系列以 $[-9, 9]$ 为区间的连续变量,大于 0 的记为向上流动感知,小于 0 的记为向下流动感知,等于 0 的记为水平流动感知,并对这列新的变量重新赋值:1 = 向上流动感知, -1 = 向下流动感知, 0 = 水平流动感知。其绝对值越大,表示被访者感知到的阶层流动幅度越大。

4. 控制变量

(1) 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男性和女性分别编码为 1 和 0,被访者的年龄跨度为 18 ~ 70 岁。此外婚姻状况、户籍状况、民族和宗教信仰也可能影响社会参与。因此本研究同时将婚姻状况^① (1 = 已婚, 0 = 未婚)、户籍状况 (1 = 城市户口, 0 = 农村户口)、民族 (1 = 汉族, 0 = 少数民族) 和宗教信仰^② (1 = 有宗教信仰, 0 = 无宗教信仰) 作为控制变量。

(2) 客观阶层

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用 SMS 2017 问卷中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个人月收入情况和职业类型作为客观阶层指标,并将其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年限由原数据库中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月收入与职业类型的分布情况参见表 1。

五、结果与分析

(一)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现状分析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1. 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的现状分析

由表 2 中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可知,从总体样本来看,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5.35,说明民众的社会参与热情是比较高的;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4.58,说

① 由于某些婚姻状况的人数较少(例如离婚、丧偶),同时在本研究中婚姻状况仅作为控制变量而不作为主要探讨的变量,所以将除已婚之外的人数一并统计到未婚的情况中。

② 将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他宗教和有民间信仰的被访者合并为一类,即有宗教信仰者。

明民众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认知评价比较保守，不高不低。对于不同流动感知的民众，其社会参与意愿和主观阶层得分存在差异：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民众，其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5.41，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4.80；具有水平流动感知的民众，其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5.21，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4.02；具有向下流动感知的民众，其社会参与意愿的平均得分为 5.15，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为 3.96。总体来说，在社会参与意愿和主观阶层的平均得分上，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民众得分最高，而具有向下流动感知的民众得分则最低。

此外，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2.3%，水平流动感知和向下流动感知的人数分别占 15.0% 和 12.7%，由此可见，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感知到自己所处阶层位置发生了向上流动。

表 2 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的描述性分析（平均数 ± 标准差）

	总样本	向上流动感知	水平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感知
社会参与意愿	5.35 ± 0.94	5.41 ± 0.90	5.21 ± 1.02	5.15 ± 1.02
主观阶层	4.58 ± 1.61	4.80 ± 1.45	4.02 ± 2.04	3.96 ± 1.59
样本量	22669	16400 (72.3%)	3389 (15.0%)	2880 (12.7%)

2.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参见表 3），现在的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过去的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同时，过去的主观阶层与现在的主观阶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探究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的关系时，必须同时考虑过去和现在的主观阶层，这也说明了基于阶层流动感知的视角来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表 3 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相关关系

	社会参与	现在的主观阶层	过去的主观阶层
社会参与	1		
现在的主观阶层	0.009	1	
过去的主观阶层	-0.097***	0.604***	1

注：*** $p < 0.001$ 。

(二) 不同流动感知方向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1. 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人口学变量、客观阶层、主观阶层以及主观阶层与阶层流动感知方向的交互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参见表4）。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Chatterjee & Price, 1977: 143—174）。

表4 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人口学变量	性别（男性=0）	0.020** (3.010)	0.015* (2.216)	0.019** (2.928)	0.014* (2.135)	0.014* (2.081)
	年龄	-0.063*** (-7.439)	-0.050*** (-5.817)	-0.052*** (-6.223)	-0.040*** (-4.672)	-0.041*** (-4.825)
	婚姻状况（未婚=0）	0.013 (1.501)	0.029** (3.397)	0.015 (1.776)	0.031*** (3.623)	0.030*** (3.576)
	户籍状况（农村=0）	-0.055*** (-8.077)	-0.059*** (-8.384)	-0.052*** (-7.718)	-0.057*** (-8.166)	-0.057*** (-8.262)
	民族（少数民族=0）	0.017* (2.533)	0.015* (2.313)	0.015* (2.292)	0.014* (2.093)	0.014* (2.117)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0）	-0.039*** (-5.951)	-0.029*** (-4.347)	-0.035*** (-5.224)	-0.025*** (-3.790)	-0.025*** (-3.694)
客观阶层	月收入情况		-0.016* (-2.092)		-0.019* (-2.522)	-0.02* (-2.573)
	受教育年限		0.070*** (9.745)		0.068*** (9.452)	0.067*** (9.320)
	职业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0）					
	专业技术人员		0.032* (2.126)		0.028 (1.885)	0.026 (1.75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012 (1.061)		0.010 (0.885)	0.008 (0.721)
	商业、服务业人员		0.071*** (5.172)		0.065*** (4.779)	0.064*** (4.673)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0.014 (1.438)		0.014 (1.502)	0.013 (1.39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0.077*** (6.651)		0.074*** (6.372)	0.072*** (6.246)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客观阶层	军人		0.011 (1.557)		0.011 (1.669)	0.012 (1.708)
	其他从业人员		0.106 *** (5.855)		0.100 *** (5.506)	0.098 *** (5.390)
主观阶层	过去主观阶层			-0.148 *** (-17.763)	-0.142 *** (17.105)	-0.104 *** (-8.592)
	现在主观阶层			0.110 *** (13.358)	0.115 *** (13.661)	0.088 *** (7.957)
	流动感知方向					0.045 *** (4.485)
	现在主观阶层 × 流动感知方向					0.028 *** (4.022)
	F	35.331 ***	27.754 ***	67.893 ***	43.443 ***	40.423 ***
	调整的 R ²	0.009	0.017	0.023	0.031	0.032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由表 4 可知，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主要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的社会参与意愿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参与意愿呈现降低的趋势；婚姻状况与社会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相关；农村居民较之城市居民的参与意愿更强烈；汉族和无宗教信仰的居民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意愿。模型 1 仅能解释 0.9% 的总方差。

模型 2 中，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之后，探讨了客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收入情况上，随着个人月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参与意愿越低。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年限越长，居民的社会参与意愿越强烈。在职业方面，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更高一些，而剩余三类职业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客观阶层显著影响着居民的社会参与意愿。模型 2 能够解释 1.7% 的总方差，与模型 1 相比增加了 0.8% 的解释力。

模型 3 中，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之后，探讨了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过去的主观阶层显著地负向预测了社会参与意愿，现在的主观阶层显著地正向预测了社会参与意愿。模型 3

能够解释 2.3% 的总方差，与模型 2 相比增加了 0.6% 的解释力。这说明与客观阶层相比，主观阶层确实有更大的解释力。

模型 4 中，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变量以后，进一步探讨了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且与模型 3 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客观阶层的加入不会削弱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模型 5 为全模型，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变量以后，将主观阶层、流动感知方向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一并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人口学变量、月收入情况、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依然对社会参与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同时主观阶层、流动感知方向及其两者的交互项也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为了进一步探讨在不同阶层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如何影响社会参与意愿，本文也对此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

2. 简单效应分析

本文以社会参与意愿为因变量、主观阶层为自变量、阶层流动感知方向为调节变量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如图 4^① 所示。当个体感知到阶层向上流动时，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越强烈 ($\beta = 0.014$, $t = 2.694$, $p = 0.007$)；当个体感知到阶层水平流动 ($\beta = -0.016$, $t = -2.016$, $p = 0.044$) 和向下流动 ($\beta = -0.042$, $t = -3.884$, $p < 0.001$) 时，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呈明显下降的趋势。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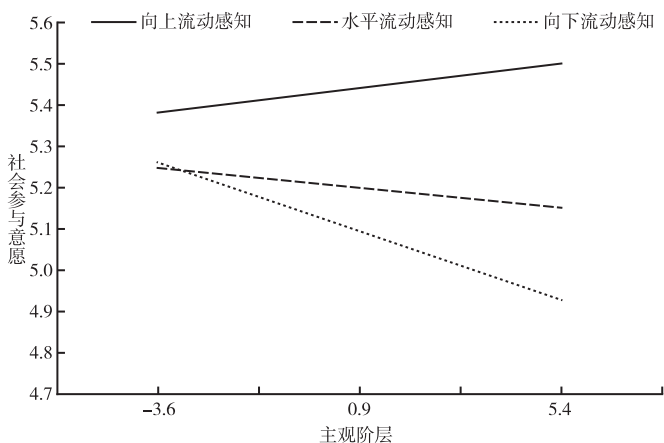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阶层流动感知方向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① 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民族和有无宗教信仰已进行了控制。

(三)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1. 向上流动感知幅度的现状分析

从阶层流动感知的幅度大小来看,向上流动以小幅度流动为主(参见表5^①),主要集中在1~3个阶层的流动幅度上。这与帕金所说的“缓冲地带”是一致的,即阶层流动主要发生在相邻的阶层位置之间(李路路,2003),因此大多数流动都属于“小幅度流动”而非“大幅度流动”。这样的流动模式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表5 不同向上流动感知幅度的人数统计 (N = 16400)

阶层流动感知幅度	频数	百分比 (%)
0.1~1个阶层	5795	35.34
1.1~2个阶层	5245	31.98
2.1~3个阶层	3344	20.39
3.1~4个阶层	1438	8.77
>4个阶层	578	3.52

2.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文按流动感知的平均分加减两个标准差将被访者分为小幅度流动感知组(低于平均数减两个标准差)和大幅度流动感知组(高于平均数加两个标准差)。如图5所示,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状况、民族和宗教信仰以后,当个体感知到小幅度的向上流动时,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越强烈($\beta = 0.022$, $t = 3.549$, $p < 0.001$);而当个体感知到大幅度的向上流动时,主观阶层越高,社会参与意愿则越低($\beta = -0.041$, $t = -7.070$, $p < 0.001$)。由此可见,在大幅度的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消失,甚至出现了负向预测作用。结果支持并验证了研究假设2。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变,阶层流动给民众带来的不仅是客观生活水平或

① 已将具有水平流动感知的被访者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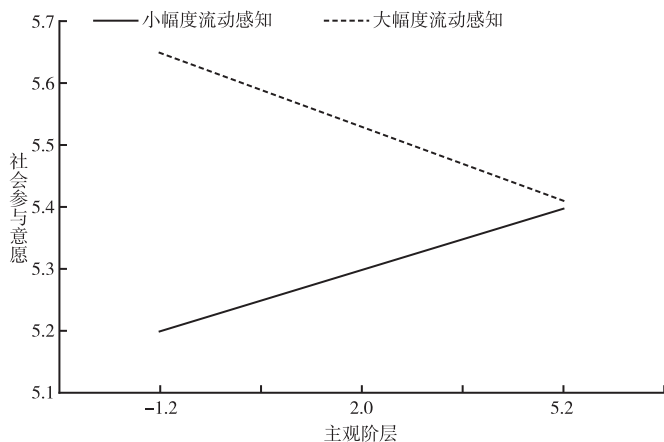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幅度的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

环境上的重大改变，更多的是对不同阶层居民的社会心态，心理体验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SMS2017 的网络数据，基于阶层流动感知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阶层会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参与意愿，而且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指标后，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的解释力为 1.4%，其与客观阶层相比表现出更强的预测力。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流动感知条件下，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差异的。对这种差异的探讨不但有助于增进对于阶层及其变化的心理内涵理解，同时也为阶层意识和行为研究提供了动态性、过程性的分析思路和解释视角，为社会学中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定补充。

首先，在向上流动感知条件下，高主观阶层者比低主观阶层者有更强烈的参与意愿，这与需要满足理论和“文化适应论”的解释是相符合的。第一，高主观阶层者的社会性需求可以通过社会参与得到充分地满足，其参与积极性自然会更高。第二，高主观阶层者对自己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和乐观 (Jackman, 1972)，根据“文化适应论”，他们有更多的动机和更强烈的意愿通过社会参与的形式来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文化规范。

其次，在水平流动感知条件下，高主观阶层者的社会参与意愿呈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当个体感知到自己的阶层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可能不会发生变化的时候，自我满足的减少也降低了他们对外界环境的依赖 (Kraus et al., 2012)。这种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减少使得高主观阶层者即使在具备了社会参与的条件其意愿也会较低。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高阶层流动受阻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样的情况需要整个社会引起重视，“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社会中上层群体历来对社会影响很大（李强，2003），为此，应当强调整体至上、公利优先的价值取向，积极培育民众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邓名瑛，2007）。在促进阶层流动的同时也应让社会责任成为阶层获益的前提，让高阶层群体成为社会参与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中流砥柱。

最后，在向下流动感知条件下，对于高主观阶层者来说，当他们感知到现在自己所处的阶层有所下降时，自然就会体验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参与的意愿就会有所降低。同时，无论主观阶层的高低，具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要比具有向下流动感知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意愿，这可以间接表明向上的阶层流动感知对不同阶层居民的社会参与意愿都具有促进作用。

从流动幅度的大小来看，当流动幅度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主观阶层越高的个体的社会参与意愿才越强烈。当向上流动幅度过大时，主观阶层对社会参与意愿则表现出反向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有序的阶层流动有利于社会进步，而盲目的阶层流动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关丽丽、崔淑芳，2007）。当社会成熟后，阶层流动多以小幅度流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一夜暴富式的“流动”机会减少了，社会结构进入转型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李培林，2017），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大幅度流动所造成的对社会参与意愿的消极作用。

总而言之，从静态的主观阶层视角转向与阶层流动感知的动态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主观阶层与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对阶层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尤其是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为社会构建起一个“安全阀”和“缓冲带”，从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马传松、朱桥，2012）。为此有学者主张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郑杭生，2009）。这就意味着阶层结构不应是固化不变的，而是应具有流动的机会与可能性。同时既要避免底层“一夜暴富”式的阶层向上流动，也要避免高层“一跌到底”式地进入社会底层。由此看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与权益保障机制，破除妨碍阶层流动的体制弊端，促进公平有序、正义递进的阶层流动，是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待发展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了主观阶层、流动感知和社会参与意愿的关系，缺少对社会参与行为的直接测

量, 尽管行为意愿与行为密切相关, 但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其次, 从研究样本来看, 主要来源于以智能手机用户为调查对象实施网络调查, 研究结果和结论是否适用于全国样本仍需要展开进一步探讨。最后, 本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解读了流动感知对主观阶层和社会参与意愿关系的影响, 对传统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聚焦客观指标提供了补充, 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对不同形式的流动(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主客观的流动以及预期的流动等展开更加多元化的探讨, 丰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 邓名琰, 2007, 《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 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 《伦理学研究》第6期。
- 范晓光、陈云松, 2015, 《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关丽丽、崔淑芳, 2007,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探析》,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9期。
- 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第6期。
- 雷开春, 2015, 《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 《青年研究》第4期。
- 李春玲, 2018, 《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问题——中国青年社会学的关注点及研究取向》, 《青年探索》第2期。
- 李路路, 2003, 《再生产的延续: 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路路、朱斌, 2015,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 《文化纵横》第5期。
- 李培林, 2017,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 问题和对策》,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
- 李强, 2003, 《社会分层与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
- 刘长江、郝芳, 2015, 《不对称社会困境中的决策: 行为的双重模式》, 《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柳拯、刘东升, 2013, 《社会参与: 中国社会建设的基础力量》,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陆学艺, 2003,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 《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马传松、朱桥, 2012, 《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 《重庆社会科学》第1期。
- 马斯洛, 2014, 《马斯洛精选集: 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曹晓慧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彭兰, 2008, 《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钱民辉、陈旭峰, 2014, 《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表现与危害》, 《人民论坛: 中旬刊》第1期。
- 盛智明, 2013,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第4期。
- 时昱、沈德赛, 2018,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现状、问题与路径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帅传敏、张钰坤, 2013, 《中国消费者低碳产品支付意愿的差异分析——基于碳标签的情景实验数据》, 《中国软科学》第7期。
- 孙灯勇、郭永玉, 2016, 《相对剥夺感: 想得, 应得, 怨愤于未得》, 《心理科学》第3期。
- 佟成军, 2017, 《关于网络调查与传统纸质调查差异的比较分析》, 《中国统计》第1期。

- 王俊秀, 2018, 《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 《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 王新松, 2015, 《公民参与, 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 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浙江学刊》第1期。
- 吴炜, 2016, 《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预期研究》,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杨宜音、王俊秀, 2013,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喻国明, 2015, 《全媒体时代网民心理疏导机制》, 《人民论坛》第22期。
- 张翼, 2011,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 CGSS 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
- , 2016,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镇、张建新、孙建国、薛承会, 2012, 《离退休人员社会参与度与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6期。
- 郑杭生, 2009, 《五大挑战催生中国式“紧绷”——社会弹性与社会刚性的社会学分析》, 《人民论坛》第10期。
-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2018,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月 (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
- Abramson, P. R. & J. W. Books 1971,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ong Young British Men.” *Comparative politics* 3 (3).
- Bennett, R. & R. Kottasz 2000, “Emergency Fund-raising for Disaster Relie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 (5).
- Bourdieu, P. 1984,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lau, P. M. 1956,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3).
- Chan, T. W. 2018,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1).
- Chatterjee, S. & B. Price 1977, *Regression Analysis by Exampl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ollins, J. W. , K. M. Rankin & R. J. David 2015, “Downward Economic Mobility and Preterm Birth: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cago-born Upper Class White Mothers” .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19 (7).
- Côté, S. , J. House & R. Willer 2015, “High Economic Inequality Leads Higher-income Individuals to be Less Genero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52).
- Daenekindt, S. 2017,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Mobility: Social Isolation, 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Disorient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3 (1).
- Greve, F. 2009, “America’s Poor are Its Most Generous.” *The Seattle Times* (<http://seattletimes.nwsourc.com>).
- Gruenewald, T. L. , A. S. Karlamangla, P. Hu, S. Stein-Merkin, C. Crandall, B. Koretz & T. E. Seeman 2012, “History of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Allostatic Load in Later Lif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4.
- Jackman, M. R. 1972, “Social Mo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Forces* 50 (4).
- James, R. N. & D. L. Sharpe 2007,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U-shaped Charitable Giving Profil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6 (2).

- Kraus, M. W. , S. Côté & D. Keltner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1).
- Kraus, M. W. , P. K. Piff, R. Mendoza-Denton, M. L. Rheinschmidt & D. Keltner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3).
- Lee, S. & S. Pritzker 2013, "Immigrant Youth and Voluntary Service: Who Serves?"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1 (1).
- Piff, P. K. , M. W. Kraus, S. Cote, B. H. Cheng & D. Keltner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5).
- Sawaoka, T. , B. L. Hughes & N. Ambady 2015, "Power Heightens Sensitivity to Unfairness against the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8).
- Tan, J. J. X. & M. W. Kraus 2018, "Judgments of Interpersonal Warmth Predict Class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andidate Support." *Social Cognition* 36 (1).
- Tolsma, J. , N. D. De Graaf & L. Quillian 2009,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ffect Antagonistic Attitudes Towards Ethnic Minorit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2).
- Turner, F. C. (Ed.) 1992,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Wiepking, P. & B. Breeze 2012,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1).
- Wilson, J. & M. A. Musick 1997, "Work and Volunteering: The Long Arm of the Job." *Social Forces* 76 (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旭运）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豆雪姣）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董洪杰）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跃）

责任编辑：罗婧